

雷海宗文集

雷海宗杂论集

雷海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雷海宗杂论集

雷海宗
——
著

雷海宗文集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雷海宗杂论集 / 雷海宗著. —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6.3

(雷海宗文集)

ISBN 978-7-201-10156-9

I. ①雷… II. ①雷… III. ①雷海宗(1902~1962)
-文集 IV. ①K825.8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40752 号

雷海宗杂论集

LEI HAIZHONG ZALUN JI

雷海宗 著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 沛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
邮政编码 300051
邮购电话 (022)23332469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电子信箱 tjrmcbs@126.com

策 划 任 洁
责任编辑 任 洁
特约编辑 金晓芸
装帧设计 王 烨
责任校对 邱 珺

印 刷 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6.875
字 数 150 千字
版次印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5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致电联系调换(022-23332469)

目 录

君子与伪君子 / 1

学者与仕途 / 5

张伯伦与楚怀王 / 7

全体主义与个体主义

——中古哲学中与今日意识中的一个根本问题 / 11

永恒的青年问题 / 18

出路问题——过去与现在 / 21

三个人的死 / 23

人生的境界(一)——释大我 / 26

历史警觉性的时限 / 33

近代化中的脑与心 / 37

史实,现实与意义 / 41

五四献言 / 45

时代的悲哀 / 48

《周论》发刊词 / 56

有关马克思的两篇文件 / 58

近代史上的梵蒂冈与世界罗马教(一)

——今日梵蒂冈与世界罗马教简介 / 63

近代史上的梵蒂冈与世界罗马教(二)

——近代史上的罗马教 / 71

耶稣会——罗马教廷的别动队 / 83

耶稣会的别动队活动 / 91

二十世纪的罗马教廷与帝国主义 / 97

欧洲人的“教名”及一般取名的问题 / 116

评汉译韦尔斯著《世界史纲》 / 119

评汤姆孙著《中世纪史》 / 130

评道森著《人类行程》 / 134

评赫克尔著《宗教与共产主义：苏俄宗教与无神论研究》 / 138

评雅斯贝斯著《近现代中的人》 / 141

读高级中学课本《世界近代现代史》上册 / 144

翻译中的小问题一束 / 149

翻译中的小问题一束(二) / 153

翻译中的小问题一束(三) / 160

翻译中的小问题一束(四) / 165

外国史译名统一问题 / 170

翻译与注释 / 175

由翻译史看翻译理论与翻译方法 / 178

《西方的没落》(第二卷部分章节) / 185

君子与伪君子

观察中国整个的历史,可能的线索甚多,每个线索都可贯串古今,一直牵引到目前抗战建国中的中国。“君子”一词来源甚古,我们现可再用它为一个探讨的出发点。

“君子”是封建制度下的名词。封建时代,人民有贵贱之分,贵者称“士”,贱者称“庶”。“君子”是士族阶级普通的尊称;有时两词连用,称“士君子”。士在当时处在政治社会领导的地位,行政与战争都是士的义务,也可说是士的权利。并且一般讲来,凡是君子都是文武兼顾的。行政与战争并非两种人的分工,而是一种人的合作。殷周封建最盛时期当然如此,春秋时封建虽已衰败,此种情形仍然维持。六艺中,礼、乐、书、数是文的教育,射、御是武的教育,到春秋时仍是所有君子必受的训练。由《左传》《国语》中,可知当时的政治人物没有一个不上阵的。国君也往往亲自出战,晋惠公竟至因而被虏。国君的子侄兄弟也都习武。晋悼公的幼弟杨干最多不过十五岁就入伍;因为年纪太轻,以致扰乱行伍而被罚。连天子之尊也亲自出征,甚至在阵上受伤。如周桓王亲率诸侯伐郑,当场中箭。当兵绝非如后世所谓下贱事,而是社会上层阶级的荣誉职务。平民只有少数得有入伍的机会,对于庶人的大多数,当兵是一个求之不得的无上权利。

在这种风气之下,所有的人,尤其是君子,都锻炼出一种刚毅不屈、慷慨悲壮、光明磊落的人格。“士可杀而不可辱”,在当时并非寒酸文人的一句口头禅,而是严重的事实。原繁受郑厉公的责备,立即自杀。晋惠公责里克,里克亦自杀。若自认有罪,虽君上宽不责,亦必自罚或自戮。鬻拳强谏楚王,楚王不从;以兵谏,

楚王惧而听从。事成之后，鬻拳自刎，以为威胁君上之罪罚。接受了一种使命之后，若因任何原因不能复命，必自杀以明志。晋灵公使力士鉏麇去刺赵盾，至赵盾府后，发现赵盾是国家的栋梁，不当刺死，但顾到国家的利益，就不免违背君命；从君命，又不免损害国家。所以这位力士就在门前触槐而死。以上不过略举一二显例，类此的事甚多，乃是当时一般风气的自然表现。并且这些慷慨的君子，绝不是纯粹粗暴的武力。他们不只在行政上能有建树，并且都能赋诗，都明礼仪，都善辞令，不只为文武兼备的全才。一直到春秋末期，后世文人始祖的孔子，教弟子仍用六艺，孔子自己也是能御能射的人，与后世的酸儒绝非同类的人物。

到战国时，风气一变。经过春秋战国之际的一度大乱之后，文化的面目整个改观。士族阶级已被推翻，文武兼备的人格理想也随着消灭。社会再度稳定之后，人格的理想已分裂为二，文武的对立由此开始。文人称游说之士，武人称游侠之士。前者像张仪以及所有的先秦诸子，大半都是凭着一三寸不烂之舌，用读书所习的一些理论去游说人君。运气好，可谋得卿相的地位；运气坏，可以招受奇辱。张仪未得志时，曾遭楚相打过一顿，诬他为小偷。但张仪绝不肯因此自杀，并且还向妻子夸口：只要舌头未被割掉，终有出头露面的一天。反之，聂政、荆轲一类的人物就专习武艺，谁出善价就为谁尽力，甚至卖命。至于政治主张或礼仪文教，对这些人根本谈不到。所以此时活动于政治社会上的人物，一半流于文弱无耻，一半流于粗暴无状。两者各有流弊，都是文化不健全的象征。

到汉代，游侠之士被政府取缔禁止。后世这种人在社会上没有公认的地位，但民间仍然崇拜他们，梁山泊好汉的《水浒传》就是民间这种心理的产品。

汉以后所谓士君子或士大夫完全属于战国时代游说之士的系统。汉武帝尊崇儒术,文士由此取得固定不变的地位。纯文之士,无论如何诚恳,都不免流于文弱、寒酸与虚伪;心术不正的分子,更无论矣。唯一春秋以上所遗留的武德痕迹,就是一种临难不苟与临危授命的精神。但有这种精神的人太少,不能造出一个遍及社会的风气。因为只受纯文教育的人很难发挥一个刚毅的精神,除非此人有特别优越的天然秉赋。可惜这种秉赋,在任何时代,也是不可多得的。

至于多数的士君子,有意无意中都变成伪君子。他们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。身体与人格虽非一件事,但一般的讲来,物质的血气不足的人,精神的血气也不易发达。遇到危难,他们即或不畏缩失节,也只能顾影自怜的悲痛叹息,此外一筹莫展。至于平日生活的方式,细想起来,也很令人肉麻。据《荀子》记载,战国时代许多儒家的生活形态已是寒酸不堪。后世日趋愈下。汉代的董仲舒三年不涉足自己宅后的花园,由此被人称赞。一代典型之士的韩愈,据他的自供,“年未四十,而视茫茫,而发苍苍,而齿牙动摇”。这位少年老成者日常生活的拘谨迂腐,可想而知。宋明理学兴起,少数才士或有发挥。多数士大夫不过又多了一个虚伪生活的护符而已。清初某理学先生,行步必然又方又正,一天路上遇雨,忽然忘其所以,放步奔避。数步之后,恍然悟到行动有失,又回到开始奔跑的地方,重新大摇大摆地再走一遍。这个人,还算是诚恳的。另外,同时又有一位理学先生,也是同样地避雨急走,被旁人看见指摘之后,立刻掏腰包贿赂那人不要向外宣传!这虽都是极端的例子,却很足以表现一般士君子社会的虚伪风气。这一切的虚伪,虽可由种种方面解释,但与武德完全脱离关系的训练是要负最大的责任的。纯文之士,既无自卫

的能力也难有悲壮的精神,不知不觉中只知使用心计,因而自然生出一种虚伪与阴险的空气。

我们不要以为这种情形现在已成过去,今日的知识阶级,虽受的是西洋传来的新式教育,但也只限于西洋的文教,西洋的尚武精神并未学得。此次抗战这种情形暴露无遗。一般人民,虽因二千年来的募兵制度,一向是顺民,但经过日本侵略的刺激之后,多数都能挺身抵抗,成为英勇的斗士。正式士兵的勇往直前,更是平民未曾腐化的明证。至于知识阶级,仍照旧是伪君子。少数的例外当然是有的,但一般的知识分子,在后方略受威胁时,能不增加社会秩序的混乱,已是很难得了。新君子也与旧君子同样的没有临难不苟的气魄。后方的情形一旦略为和缓,大家就又从事鸡虫之争;一个炸弹就又惊得都作鸟兽散。这是如何可耻的行径!但严格讲来,这并不是个人的错误,而是根本训练的不妥。未来的中国非恢复春秋以上文武兼备的理想不可。

征兵的必要,已为大家所公认,现在只有办理方法的问题。目前的情形,征兵偏重未受教育或只受低级教育的人,而对知识较高的人几乎一致免役。这在今日受高深教育的人太少的情况之下,虽或勉强有情可原,但这绝非长久的办法。将来知识分子不只不当免役,并且是绝对不可免役的。民众的力量无论如何伟大,社会文化的风气却大半是少数领导分子所造成的。中国文化若要健全,征兵则当然势在必行,但伪君子阶级也必须消灭。凡在社会占有地位的人,必须都是文武兼备,名副其实的真君子。非等此点达到,传统社会的虚伪污浊不能洗清。

(原载昆明《今日评论》1939年1卷4期,1939年1月22日)

学者与仕途

最近行政院长翁文灏先生在首都对十科学团体联合年会演讲时说：“科学家宁可饿死，也不能去作别的事！”翁先生以学者而做官已到首揆之尊，竟说出这样的话，其惹人注意是很自然的，话中含有无限的感慨与隐痛也是显然的。但我们不愿对个人多所揣测，我们只愿趁此机会谈一谈翁氏所提出的一个根本问题，就是学者入仕的问题。

学而优则仕，甚至学尚未优也要勉强去向仕途钻营，在过去的中国本是常事，也是大家所认为当然的事。这在过去，确也有它不得不如此的道理在。过去一个读书人，除了做官外，的确无事可做。今日一切的社会事业以及其他与政治无关的工作机会，在过去根本不存在，除做官外并无任何事业可言。固然，一个人既然读书明理，尽可关起门来修身养性，但这种过高的理想不能望之于一般的凡士。所以我们站在今日的立场而对过去整个的局面下断语尚无不可，若不顾其他而专指摘“学而优则仕”的现象，则为不负责任与忽略实情的苛论，不可为训。

近代的中国，尤其民国以来的中国，整个的政治社会局面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，我们的国家虽尚未达到十足现代化的境界，入仕虽然仍是读书人相当重要的一条途径，但我们确已超过非“学而优则仕”不可的阶段。今日一个人如果自信有此能力，又有此机会，同时又有此兴趣，即或是一个学有专长的科学家，仍不妨去做官。翁氏的话似乎是有所为而发，不可视为正常之理；如果把翁氏的话推到尽头，那就等于说把国家大事都给不学无术的人去管，对此恐怕翁氏绝不会首肯。但反过来讲，无此机会，尤

其不敢十足自信有此能力的人,大可不必发展此种兴趣,不必转弯抹角的去求官做。今日的时代已非学而优则仕的时代,但过去养成的学而优则仕的心理仍然深入人心,稍有机会即由学场跳入官场的现象未免太多,没有机会而千方百计去钻营的现象尤其令人发生无穷的感慨。翁氏的话,除了可能的个人隐痛外,大概也就是有见于此而发的感慨。默察今日求仕的士群,我们可以发现三种不同的类型。第一种是走直路的,干脆的奔走请托。这些人尚不失为老实人,最值得人同情。第二种是走曲线的,由骂入手,希望骂得对方不能忍受时而一纸官诰送上门来。第三种是直路曲线一齐走的人:光走直路,企望甚高,一旦任命发表而嫌官阶太低时,马上一变而为清高的论客,愤激的名士,前进的导师。此种人远较第二种人高明,第二种人心里明白,知道自己是在走曲线,此种曲直并进的人却很善于自欺,沉重的怨气往往能使他们相信自己真是富于正义感的忧时之士,自己对自己也不承认所“忧”的只是官阶的高低。第一种人可令人同情,第二种人尚可令人原谅,只有第三种人既不能引起同情,也更不能叫人原谅。追根究底,这还是“学而优则仕”的传统观念在作祟,所以在根本道理上我们虽不能完全接受翁院长的说法,但为矫正目前种种可憾的表现,我们仍愿承认翁氏的话是值得有政治兴趣的学人反复咀嚼的。

(原载《周论》二卷十五期,1948年10月22日)

张伯伦与楚怀王

今日张伯伦心中作何感想,只有他自己知道,连对最亲近的人恐怕他也不肯吐露真情。并且由英国人的不善于自问自省的特点看来,大概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心中的味道到底是占苦辣酸甜咸的哪一种。几百年来,英国于没有充分的准备之下而被迫参战的,尚以此为第一次。对今日英国处境的困难,张氏要负大部的责任,这不只是英国反对党的门户之见,也是英国以及世界各国人士的多数看法。后世的人对张伯伦如何评判,大半要看目前欧洲战事的结果。如果英国战败,历史家一定认为大英帝国是由张氏手中断送的。即或英国战胜或两方不分胜负而妥协,后世的人最少也要说张氏是一个拿国命作儿戏的顽固人物。今日的世界,正处在一个极端无情的大时代。凡负政治重任的人,不能走错一步。一步走错,轻则丧权,重则亡国。路线走错之后,无论如何自辩自解,也不能告无罪于天下,更不能告无罪于后世。凡是强国,都有一贯的外交政策。但政策尽管不变,运用却必须灵活。从政的人最忌成见太深,成见太深必要招致愚而好自用的错误。“仇俄”是英国自十九世纪以来外交政策的主要一面,但大英帝国的政策绝不只此一面。张氏为成见所蔽,把国内政治的分野与国际政治的纵横竟然混为一谈,把“仇俄”作为全面的政策,结果遇到四百年以来所未有的外交失败与战事危机,这在法治精神特别发达的英国可以引咎辞职了事,并且在下届内阁中仍能占一重要地位,若在舆论比较偏激的国家恐怕绝不会有如此便宜的下场!战事尚未结果,所以张伯伦的地位也还在未定之天。但中国在战国时有一个大国的元首,行为颇与张伯伦相仿佛,最后个

人惨死异邦,把国家大局也弄得一败不可收拾,这个人就是楚怀王。

楚怀王即位于公元前三二八年。当时天下有三个强国,东为齐,西为秦,南为楚。此外燕韩赵魏是二等强国。齐楚联盟抗秦。齐靠楚的支持,乘着燕国内乱的机会,把燕全部占领(公元前三一四年)。秦国要破坏齐国的优势,于是在次年就派善于辞令的张仪到楚国去活动。张仪大概知道楚怀王的弱点,向他说:“大王苟能楚闭关齐,臣请使秦王献商於之地六百里。”怀王大喜过望,一般承颜色的臣子也都称贺。只有陈轸一个不贺,并且谏楚王说:

臣见商於之地不可得,而患必至也……夫秦所以重王者,以王有齐也。今地未可得而齐先绝,是绝孤也。秦又何重孤国?且先出地后绝齐,秦计必弗为也。先绝齐后责地,且必受欺于张仪。受欺于张仪,王必惋之。是西生秦患,北绝齐交,则两国兵必至矣。

楚怀王不听,一面派人绝齐,一面派人随张仪到秦国去接收土地。到秦国后,张仪忽然堕车受伤,三月不朝也不能见客。楚国的使臣向秦索地,秦人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张仪身上。三月之后,秦国已得了齐楚完全绝交的可靠情报,同时秦也暗中已与齐定了同盟条约,张仪的伤也已养好,出来向楚国的使臣说:“从某至某,臣有奉邑六里,愿以献大王左右!”楚使说:“臣闻六百里,不闻六里!”张仪:“仪固以小人,安得六百里?”

使臣回国报告之后,怀王大怒,要发倾国之师攻秦。陈轸阻谏,劝他以国事为重,不要完全以个人的好恶去决定国家的最后

政策。怀王不听，楚攻秦，齐助秦夹击楚，楚国大败，数百年来国防要地的汉中也丧于秦国（公元前三一一年）。秦既得了汉中，从此可随时威胁楚国的心腹之地。

秦楚的关系僵持了许久，后来两国算是又言归于好，怀王的太子并往秦作质子（公元前三〇三年）。但太子终有太子的脾气，次年在秦宫中杀人，畏罪逃回楚国。这正好给了秦国一个再向楚进攻的藉口。自从十年前的一着失算，楚的国力已经大削，此次结果又被秦打败。至此怀王才想到旧梦重圆的计策，又与齐联盟，并派太子到齐作质（公元前三〇〇年）。秦见齐楚又合，于是次年遣书楚王：

始寡人与王约为弟兄，盟于黄棘，太子为质，至欢也。太子凌杀寡人之重臣，不谢而亡去，寡人诚不胜怒，使兵侵君王之边。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于齐以求平。寡人与楚接境壤界，故为婚姻，所从相亲久矣。而今秦楚不欢，则无以令诸侯。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而相约，结盟而去，寡人之愿也，敢以闻下执事！

群臣多劝怀王勿往秦赴约，以免受骗。但怀王居然仍以秦的诺言为可以听信，亲往武关赴会。楚王一到秦即闭关，把楚王带到咸阳。并且秦王不肯与怀王分庭抗礼，要叫他朝拜如蕃臣。怀王大怒，拒绝见礼。秦要怀王割地，方能放他回国。怀王非先定盟回国，不肯交地。但秦要先得地，然后再放人回国。怀王屡次受欺之后，总算学了一分乖，始终不肯答应秦的要求。

二年后（公元前二九七年），楚怀王乘隙向东北逃往赵国，求赵国护送回楚。赵畏秦，不敢收留。不久秦兵居然追至赵国，挟怀

王又回秦,监视加严,无从再逃。同时秦仍继续向楚进攻,屡败楚兵。到公元前二九六年,怀王愤恨发病而死。秦把怀王的灵柩送回楚国,全体的楚人无不悲悼。但楚人所悲悼的是怀王个人的命运。若由大局方面着眼,楚国的前途几乎完全是被怀王所断送的。

楚怀王在秦为虏时的心境如何,史上虽无明文,但我们很易想见他的悔恨与懊丧。今日的张伯伦大概还没有如此的可怜。但假设英国最后战败,恐怕那时的张伯伦就是第二个抱恨终天的楚怀王了!

(原载《战国策》第六期(欧战号)民国廿九年六月二十五日, 1940年6月25日)

全体主义与个体主义

——中古哲学中与今日意识中的一个根本问题

人类自文化初开群聚而居以来，有意无意间就时常遇到一个很难满意解决的问题，就是个人与团体的关系的问题。到底是个人为团体而生存，或团体为个人而存在？个人的利益高于团体的利益，或团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？许多的哲学家，一谈到政治社会问题时，也不免要对此煞费心思。有的时代，甚至这是哲学界的中心问题。团体高于一切的说法，可称为全体主义；个人高于一切的说法，可称为个体主义。两种主义的竞争，在各国之内与国际之间，都是人类目前的切肤问题。共产主义与各形各色的社会主义，都是有全体性的；民主主义，自由主义，个人主义，都是有个体性的，但这些名词，今日都与入主出奴的情绪搅在一起，所以本文只能用全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两词，希望可以少引起一点情感的联系作用。并且当局者总不免迷惑，为摆脱我们今日所难避免的局内成见，我们似乎可对从前一个相似的时代加以研究，虽不见得能使我们解决今日的问题，但最少可叫我们对当前的局面有比较客观而深入一层的了解。在整个的人类史上，于史料许可的范围内，我们可说欧西的中古时代是对全体与个体的关系最为注意的，当时的第一流思想家都费大部的精神去推敲这个问题。

中古哲学讨论这个问题时，采取的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方式：就是共相对特相的关系。“形而上者谓之道”，共相是形而上的；“形而下者谓之器”，特相是形而下的。古今世界有无数的马，各马之间无论颜色、身材、速率、性格，以及身心的一切琐碎之点，

没有两匹马完全相同。每一匹马是一个特相,并且是很“特别”很“独特”的特相。每个“特相”的马都是我们能见能闻能触的形下之器。但虽无两马相同,我们却毫不犹豫的总称古往今来所有的坐乘为“马”。似乎在一切能见能闻能触的形而下的马之外与之上,还有一切的马所以为“马”的原理,一个不可捉摸而仍然非常实在的形而上之道。否则既然没有两匹马相同,我们安能总称所有类似而不相同的四足物为“马”? 一切的马所以为马的根本之理就是共相。

中古哲学家中,一派特别注意共相,认为形而上的道是唯一的实在,形而下的器只是偶然的外相,一切马所以成马的根本性质才是重要的;并且只有这个共相是实在的,一切个别的马不过是马的共相的临时表现而已。这一派的说法,在当时称为唯实主义:唯有共相是实在的。对立的一派,正正相反,所取的是一种常识的态度。具体的当然就是实在的,实在的当然就是具体的。并且只有具体的才能称为实在,只有一个一个的马古往今来实际的存在。虽然没有两匹马完全相同,但所有的马之间有许多主要的公同点,例如善走、可乘,特别是嘶声,独有的鬃形等等。我们为便利起见,总称一切赋有以上各种特征的四足兽为“马”,这个“马”只是人类为自己的便利所定的“名”,本身并非实在。这一派称为唯名主义:一切所谓共相都是人定的名称,只有每个特相才是实在的。

这两派的思想,互相争辩甚烈。当初他们只谈一些不相干的例证,如马、狗、舟、车、花、木之类。但不知不觉间,他们就把注意力转移到比较切身的问题,如教会、上帝、国家等。按唯名主义的说法,教会只是许多信徒所组合而成的团体的“名”,实在的只有个个的信徒。教会属于信徒,教会可存可废,全听信徒的便利。教